

经济危机何以诱发贸易保护主义猖獗？

——基于全球公共产品和集体行动的理论解释

黄莹 林金忠

内容提要 在经济危机下,各国采取积极的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为避免乘数效应大打折扣,内在地要求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的供应中,各国都有“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其破坏自由贸易协定所获取的利益远远大于受到的惩罚,进而导致集体行动难题,终而陷入囚徒困境,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猖獗。基于此,我国应扭转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转向于依靠国内需求为主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同时,应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多边体制。

关键词 经济危机 贸易保护 多边贸易体制

黄莹,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教授 361005

林金忠,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以比较优势学说^[1]和要素禀赋理论^[2]为代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无论贸易伙伴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总是最佳选择。但是,纵观全球贸易政策的发展史,无论是李嘉图,还是伊·菲·赫克歇尔和俄林,所设计的国际自由贸易的理想模式远非现实中各国贸易政策的真实写照,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如影随形”,似乎是一对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低迷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抬头,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远例且不论,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出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

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尽管二十国集团(G20)在2008年11月份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其中17个国家已经设立了新的贸易限制^[3]。照此趋势发展,极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新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战,一旦失控,不但会导致全球贸易衰退,而且会使得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前车可鉴,美国在1930年出台的大规模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法案曾经滋生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从而放大了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破坏性。因此,贸易保护主义非但不是解救危机的良方,反而是恶化危机的加速器。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既然在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有害于经济复苏，为何各国口头上喊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实际行动上却争相采取或明或暗的保护主义措施，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众多文献多半仅局限于表面上的道义性谴责，而没有深究其本质。笔者认为，在经济危机这个特殊环境下，各国旨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动机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公共产品性质是解释该问题的本质。为此，本文从国际公共产品以及集体行动的视角分析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从本质层面揭示贸易保护主义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内在蕴涵于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之中

各国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或有差异，但我们不难看出的一点是，此类政策均未摆脱凯恩斯主义反萧条理论的思路框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看到这样一点，这一思路框架内在地蕴涵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凯恩斯摒弃了古典——新古典传统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的外因论，提出内因论——经济危机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亦即消费（市场）增长比所得（生产、就业）增长要慢。因此，挽救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刺激国内有效需求。这势必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通过乘数效应而扩及整个经济体。凯恩斯认为，如要乘数效应充分发挥其功效，则必须要求经济体本身处于某种程度的封闭状态，这是因为，若如一国是开放的，与其他国有贸易往来，则会产生刺激政策效果的外溢效应，乘数值会大大降低。凯恩斯写道：“设一国与他国有贸易关系，则一部分投资增量之乘数作用，将由他国之就业量享其利，因为一国之贸易顺差，将由本国多消费舶来品而减少。故设我们只讨论本国——而不讨论世界——就业量所受之影响，则我们必须降低乘数之值。”“例如，一个典型的近代社会，大概会把真实所得增量之 80% 左右用之于消费；故设该社会为一闭关体系，失业者之消费又从转移别人之消费而来，则在计及抵消因素以后，乘数之值大概不至于比 5 小许多。但设一国与他国有贸易关系，舶来消费品占总消费之 20%，失业者从举债（或其他类似方式）得来的消费，约占其平日有工可作时正常之 50%，则乘数之

值，可能低至 2 或 3。”^[4]由此可知，贸易开放带来的乘数下降不容忽视，为避免乘数下降及政策的外溢效应而使得挽救危机的效果大打折扣，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将政策效果留在国内。所谓买本国货行为，其实由此已得到了理论解释。

此外，一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在面对危机时，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在追求最大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都以本国利益为主，采取对本国有利的措施。在对外贸易政策的选取上，它们同样具有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的性质，期望某种国际贸易政策能够满足和实现它们的利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是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还是选择贸易保护政策，其出发点就是看哪种类型的贸易政策更能有效地满足和实现本国的全局利益。特别是在应对经济危机之时，各国都是以挽救本国经济为根本出发点，绝非出于国际道义、以拯救世界经济为己任。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源于国家公共产品的扩展，是伴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由多边合作机制提供的、能够使各国获得收益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世界银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为：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5]。笔者认为，全球公共产品大致可分为物质性的与非物质性的两类，前者主要指全球生态环境等有形的公共物品，而后者系指以规则、协定、合作机制等形式存在的无形的东西。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显然是属于后者。

多边贸易体制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依附于自由贸易行为的全球公共产品。它是由国际协定产生的国际组织、团体和制度，旨在敦促各成员方进行自由贸易磋商和谈判，监督条约的履行或提供各种信息及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及协调专业化分工之后的交易行为和相应的资金对流。二战以后的多边贸易体制主要以 GATT/WTO 为中心。GATT/WTO 的核心是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规定了各国在制定与实施国际贸易立法方面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以及提供争

议或争端解决的方式和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公共产品性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 排他性与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是纯公共产品的两个特性，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6]。由此可见，多边贸易体制并非纯公共产品，而是具有一定排他性的俱乐部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加入 WTO 必须具有某种资格及达到一定的条件，到目前为止，仍有约占世界 1/3 的国家和地区为非 WTO 成员^[7]。这表明，WTO 具有俱乐部产品的两个典型特性：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即俱乐部产品仅仅由其全体成员消费其资源，并且每个成员必须遵守俱乐部规则，加入俱乐部必须具有某种资格，这种排他性以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为限度，共同消费；在俱乐部成员内，单个会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到减少其他会员对该物品的消费，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的最惠国条款最能体现该特性，该条款规定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并分享各项协议带来的好处。

2. 全球供给模式

纵观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史，大致可以把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供给模式分为两个阶段：美国的霸权供给和全球主义供给模式。霸权稳定论的奠基人金德尔伯格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多数国家不愿意为国际公共物品支付成本，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国际体系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亦即霸权国家，其功能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等，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8]。1945 年到 1967 年间，美国充当了国际霸权国的角色，在其主导下，进行了关贸总协定的前几轮多边贸易谈判。但是，自 1967 年以来，美国霸权从巅峰上跌落，开始进入所谓的霸权衰落期，霸权治理出现了严重危机，多边贸易体制的供给者和维持者不再是美国单方面的霸权主义。特别是 1986 年发动的乌拉圭回合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及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转，

自由贸易的全球供给迅速增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定的全体缔约方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供给者。换言之，乌拉圭回合开创了一种新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即全球主义的供给模式。与霸权供给模式相比，其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更具合法性和持久性。

3. 非实物性公共产品

多边贸易体制是非实物性公共产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实物形态的公共产品。尽管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需要一定的实物作为载体，但其本质上是一系列国际性契约，是一个建立在国际贸易既有格局基础上的、基于规则的非平衡的管理贸易体制。各国消费该公共产品需遵循其协定与规则，这里就必然地要涉及到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及集体行动问题。

四、经济危机下贸易自由化的囚徒困境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本质上属于国际公共物品范畴，其获取和分享都离不开集体行动问题，其中势必会涉及到“搭便车”行为。倘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本国可支配资源一定的条件下，都尽可能地搭便车，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势必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国际或全球范围内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国选择遵守或破坏自由贸易协定取决于对两种贸易政策下“净得益”的权衡，亦即，遵守自由贸易协定所获得的收益减去付出的成本的净得益，以及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所获得的收益与受到的惩罚之间的净得益。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即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则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全球经济繁荣、稳定增长时，一国破坏自由贸易协定而启用贸易保护政策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由此带来的得益，因为各国对其采取的报复行为会使其得不偿失，因此，此时的贸易保护政策远非理性行为，一国不会轻易采用。但是，当世界经济萧条时，情况恰恰相反，各国行动纷纷陷入囚徒困境。在此，我们运用博弈论来进一步阐释该问题：

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 国和 B 国，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双方均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并且两国的决策者不存在信息约束，两种贸易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可以用数值衡量，如表 1 所示。如果 A、B 两国都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则各国获得 10 单位的效用，如果两国均选择贸易保护政策，则各获得 5 单位的效用。如果一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另

一国实施贸易保护,则前者损失 20 单位的效用,后者获得 30 单位的效用。因此,其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表 1 两国自由贸易的囚徒困境

A 国 \ B 国	自由贸易政策	贸易保护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	10, 10	-20, 30
贸易保护政策	30, -20	5, 5

表 2 多国自由贸易的囚徒困境

除 i 国以外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数量	0	1	2	3	4	5	……	n
i 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获得的效用值	0	6	12	18	24	30	……	x
i 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获得的效用值	-8	-2	4	10	16	22	……	y

注: n 为除 i 国以外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数量, $n \geq 0$, x, y 分别为 i 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单位效用值,且 x 严格大于 y。

对于上述博弈过程及效用数值的设定,笔者的解释是:在经济危机下,发达国家经济严重受损,国内需求低迷,如前所述,各国的首要任务是刺激国内需求,降低失业率,迅速拉动经济增长。此时,一国启用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远远高于自由贸易下的边际效用,且能在短期内迅速达到这些目标。但是,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而受到的惩罚却无法与获得的收益相提并论。因为,惩罚措施主要包括他国的贸易报复与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前者在经济危机的特殊环境下已经变得不重要,如前所述,国内的经济复苏乃是当务之急,关于后者,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DSB)诉讼成本过高,导致发展中国家放弃诉讼请求,争端解决机制很大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的专享产品。DSB 是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最依赖的解决方式,也是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之一。但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仅从争端解决处理的实践来看,这一机制就存在严重缺陷。在 DSB 已经受理的协商请求中,发达国家提起的案件占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占不到 1/3。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运作成本过高:第一,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中昂贵的法律费用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第二,制裁手段的有效性不足,考虑到政治经济成本,发展中国家难以对发达国家采取有效的制裁手段;第三,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诉讼费用与诉讼期间经受的损失无法从争端解决机制中得到真正的补偿。权衡之下,各国纷纷启用贸易保护政策。

基于以上分析,为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出尔反尔的启用贸易保护政策,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改善:第一,经济危机下,对弈者之间的合作能否维持,关键是看

(5, 5),即两国均选择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把该博弈过程一般化,我们可以得到,在经济危机下,世界上任一国家外贸政策的博弈矩阵,如表 2 所示。由分析表明,无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数量有多少,参加对弈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贸政策,一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都是最优选择。

“对不合作进行惩罚”这一威胁是否可信,要使威胁可信就必须使合作所获得的得益严格大于不合作时的得益。因此,必须减少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成本,加大对违约国的惩罚力度。比如,规定在若干年间,其他国家都联合起来,禁止对违约国产品的进口,才能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第二,正如曼瑟尔·奥尔森所认为的,集体成员的个数能影响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小集团能减少信息收集与信息交流的成本,更具凝聚力和有效性,更容易促进成员间的合作^[9]。因而加强各国所在地区的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全球合作更有效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各国政府都是本国利益的代表,其所谋求的不是国际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简而言之,国际上,各国政府都是典型的“经济人”。在经济危机下,各国采取积极的政策以刺激国内有效需求,为使政策效应尽可能地保留在国内,避免乘数效应大打折扣,内在地要求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而各种多边贸易体制所具有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多边贸易体制的供应中,每个国家都不愿意承担责任,都会有“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各国破坏自由贸易协定所获取的利益远远比受到的惩罚要大,进而导致集体行动难题,终而陷入囚徒困境。因此,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多边贸易体制寸步难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行为倾向是符合本国利益的,也是合乎理性的。

就目前中国的总体情况而言,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以至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严重影

响我国以保增长为核心的应对危机政策的实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概念的外延已扩展到了货币汇率和国际投资方面,而非单纯的商品贸易方面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中国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固然有绕过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之效,但也难免要受到国际投资方面的保护主义影响,中铝在澳大利亚的收购行动遇阻即是最好例证,凸显了中国对外投资遇到的巨大障碍。在经济危机下,一国政府如若积极地提供多边贸易体制这种国际公共物品,实际上意味着以降低本国利益为代价向其他国家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亦即一种福利的向外转移,这种行为损害的是本国利益。因此,中国应对危机政策的根本点即是转变这种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面对经济危机下日益猖獗的保护主义浪潮,我国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应对:一方面,应扭转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转向于依靠国内需求为主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环节是改革国家主导资源配置的格局,转而由市场来主导资源配置。同时,要改变极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注重社会公平。另一方面,我国应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多边体制。就目前而言,我国本身不应该参与眼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合唱”,而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但是,对于别国针对我国所采取的保护主义做法,我们要

在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框架内予以坚决反击。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试图去挽救一个本质上属于国际公共物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因为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做非但徒劳无功,甚至还要付出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代价。

注释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查尔斯·希尔:《国际贸易理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

[3]经济观察网2009年3月20日。

[4]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3页、第104-105页。

[5]Development Committee. "Poverty Reduction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ssues for the World Bank in Supporting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DcP2000-16)-World Bank. September 6, 2000.

[6]吴伟:《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7]截至2008年7月23日,全世界共224个国家和地区中仍有71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加入WTO。

[8]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3",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4-68页。

〔责任编辑 天 则〕

Why Does the Economic Crisis Induce Rampant Trade Protectionism

—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Collective Action

Huang Ying Lin Jinzhong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crisis, all countries adopt positive policies to stimulate domestic demands. To avoid the reduction of multiplier effect, it is inherently required to carry out trade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all countries have the tendency of free-rider and the benefit from undermining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y get is greater than the punishment which lead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nd get into prisoner's dilemma. Trade protectionism is increasingly rampant. Accordingly, China should reverse the pattern of over-reliance on external demand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shift to relying on domestic demand and unswervingly safeguard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of free trade.

Keywords: economic crisis; trade protection;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global public goods; collective action